本版编辑：张丹丹
E-mail：t2@studytimes.cn
Tel：010—62807315

关于当前经济形势和重点经济工作的报告

（上接1版）按照经济学的一般规律，退出量化宽松时经济肯定会减速。我们要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、实现“双中高”，不能靠超发货币，不能有这方面的路径依赖。当然，我们要让经济运行保持在合理区间，这就要实施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。提高政策的针对性、灵活性，用好积极财政政策空间相对较大的优势，合理运用降准、定向降准、降息等货币政策手段，保持经济平稳运行，妥善应对和化解风险，促进经济筑基固稳。

这两年我们采取了一些措施，通过优化组合，挖掘财政资源的潜力。比如，有不少财政存量资金趴在账上“打呼噜”，对此我们下了很大力气来盘活，取得了一定成效，现在仍有潜力。下一步，我们要打破一些条条框框的限制，改变像“打酱油的钱不能买醋”等不合理规定，切实把沉淀资金盘活，用来促进发展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。从全球范围来看，我国财政赤字率和债务率并不高，今年赤字率也就是2.4%左右。欧盟在成立之初签订过《马斯特里赫特条约》，规定财政赤字率要控制在3%以内。对这个标准，欧盟各国并没有认真执行，有的国家甚至达到7%、9%。我国的赤字率也曾到过3%。我们无须照抄他人的标准，但即便按3%这个标准，还有0.6个百分点的空间。至于债务率，2014年，美国是105%，意大利是132%，法国是96%，英国是89%，日本高达246%，相比之下，我国只有40%左右，其中中央政府债务率只有17%，地方政府的债务率虽然高一些，但其中70%左右的负债都是有资产支撑的，像地方高速公路、一些大型水利设施等，是可以收费、有回报机制的，这与很多国家政府债务不一样，他们是拿去发福利、当消费花掉了。我国中央政府债务还有强大的资产作保障，比如央企的资产。可以说，积极的财政政策还有潜力可挖，还能加力增效。

货币政策方面，这几年，我们一直坚持稳健的货币政策取向，并注重松紧适度，广义货币（M_2）增速是比较合理的，也就是综合考虑GDP增速、CPI上涨幅度、再留一点余地。今年M_2增速保持在13%左右，这是正常增长。当然现在货币池子里的水不少，关键是要进一步完善传导机制，把更多金融活水引向实体经济。我们灵活运用数量型、价格型货币政策工具适时降准、降息，来保持市场合理的流动性。我们还创造了定向降准的办法，加大对“三农”、小微企业等的支持，进一步缓解融资难、融资贵问题。对大银行，我们也有规范合理的考核机制，只要它有效服务小微企业，我们同样也给它降准。我们还注重运用创新性金融工具，如对城市地下综合管廊建设，给予政策性过桥贷款、中长期融资债券等支持；再比如最近又推出了信贷资产质押再贷款，这也是为了适应实体经济发展的需要。这方面我们也有较大的创新空间。

（三）全面深化改革，着力推进简政放权、放管结合、优化服务。我们的改革是全面深化的改革，这个题目很大，我就不展开讲了。经济体制改革涉及财税、金融、国企等诸多方面，我们一直在往前推、向纵深推进，破除制约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。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，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。

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，首先要简政放权。这可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，激发社会的创造力，有利于抑制寻租、铲除腐败。30多年前，我当过农村基层干部，那时把每个劳动力每天干什么都安排好，也是从早忙到黑，但就是吃不饱肚子。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，农村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，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没有变，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没有变，但就是放活了农民生产经营的自主权，几年时间就把肚子搞饱了，这是多少年来农民的梦想，这就把千千万万农民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了。本届政府成立伊始，开门办的第一件大事就是转变政府职能，把简政放权作为“先手棋”，下决心放权于市场、还权于企业。我在2013年全国人代会后的记者会上承诺，本届政府要砍掉1/3的行政审批事项，这个目标用了两年多的时间就提前完成，国务院部门取消或下放670多项行政审批事项，非行政许可审批也进了“历史博物馆”。我们还大力推进商事制度改革，实行先照后证。过去是企业没有证就办不了照，而要拿到证又往往得先有照，蛋生鸡、鸡生蛋，搞得老百姓团团转。这个问题解决后，社会迸发出极大创造力。这两年，诞生了2000多万个市场主体，目前新登记企业每天仍然在1万家以上。尽管有生有死，但大多数企业会不断成长壮大，成为经济发展的活力源泉。

简政放权还在路上，既有取消下放的权力存在着“中梗阻”、“最后一公里”的问题，也有政府仍管了许多不该管事情的问题。比如，有的地方搞物业服务的楼道清洁工也要办证，美甲师的资格证还分好几个等级。再比如，我讲过出国旅游要证明“你妈是你妈”的例子，这类证明还不少。钞票破了到银行去换，需要证明不是人为破坏的，而是老鼠啃的、是意外损坏的。人摔倒了、被狗咬了，送医院治疗，需要证明不是故意摔倒的、不是被自家狗咬的，才能享受医保。现在老百姓办事仍然还有不少这样那样的羁绊，我们要设身处地着想，下决心进一步简政放权。国务院部门的权下放了，地方和基层也要接得住，这得有必要的人力物力保障。商事制度改革后，企业有了照，但生产经营中仍要办许多证，对此有地方建议实行证照分离。我们将在这方面推进试点，为企业干事创业提供更好的环境。

简政放权不是一放了之，而是要放管结合，加强事中事后监管。过去坐在办公室里搞审批，那是很容易的，签个字就行了，但最后做得怎么样却少有人去过问。加强事中事后监管非常重要，也更难。目前，我国市场经济秩序还很不规范，市场竞争的公平性仍是一个弱项，要大力加强知识产权保护，打击制售假冒伪劣等行为，营造公平竞争的环境。要创新监管方式，提高监管效能。我们正在推进监管“双公开”、“双随机”。“双公开”，一方面是政务的公开，不能什么都管，要建立权力清单、负面清单、责任清单“三个清单”；另一方面是企业信息的公开，让政府充分了解监管对象的情况，让社会参与监管。“双随机”，就是监管人员、监管对象都从数据库中随机抽取产生，这让企业有了压力，也减少了监管部门寻租机会。“双随机”监管已在海关等一些领域先行先试，效果是好的。加强事中事后监管，还要推进依法监管，健全市场主体的激励约束机制，严格执行监管责任制和责任追究制。

优化服务与简政放权、放管结合是一体的。我们正在推进“互联网+政府服务”，让信息多跑路、群众少跑腿。现在不少部门都有群众和企业的各类信息，实现部门间的数据共享，就能给企业和群众办事带来很大方便。要加快推进部门间的信息联通，打破信息孤岛，最大程度地便民利民。一些必要的证件，在保障安全的前提下，可以在网上办理。这方面的潜力是很大的。总之，只有搞好“放、管、服”，才能把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创造性充分调动起来，把我们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落实到底，为发展注入强劲动力，释放改革的最大红利。

（四）改造提升传统增长引擎，增加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等有效投资。大家都担心投资下行，但实际上我国有效投资的潜力是很大的。尤其是增加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供给这一传统引擎应当改造提升。比如在基础设施方面，我们用30多年的时间干了西方国家几百年干成的事情，确实了不起，也让他们刮目相看。我国基础设施建设能力强、成本低，无论在发展中国家还是在发达国家竞标中，除一些因政治因素外，多数项目都能成功。但同时我国基础设施相对仍然十分薄弱，人均存量仅为西欧的1/3、北美的1/4。特别是我们的西部地区，铁路、公路的路网密度仅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一半。还有西北地区资源性缺水、西南地区工程性缺水都相当严重。我到中西部的贫困地区调研，当地农民讲，日子过得难，主要还是水、路等问题没有解决。因此，我们要继续推进基础设施建设，并向中西部地区倾斜。同时，要扩大医疗健康、居民养老、教育培训、文化体育等公共服务方面的投资，满足群众多层次、多样化需求。

有效投资最大的潜力在新型城镇化。“十二五”期间，全国保障性安居工程开工近4000万套，其中约一半是棚户区改造。但没有改造的棚户区仍然很多，几年前通过遥感实测和数据统计，全国还有约1亿人居住在棚户区。这些人不一定都有城镇户籍，即使是农村户籍，也很难再回到农村，要想办法改善他们的居住条件。这些年我国城镇化进程较快，地上设施建设得比较好，但地下设施还很薄弱，也迫切需要加快建设。我们现在正在大力推城市地下综合管廊建设。总之，要积极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，发挥其对投资和消费的带动作用。

在产业改造升级上，也有很大有效投资需求。我们不少工业企业，不仅装备、技术、工艺比较落后，建筑、管道等也比较陈旧，安全生产隐患不少，甚至一些工业企业的厂房、设备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留下来的，需要加大改造力度。我们实施“中国制造2025”、“互联网+”行动计划，促进工业智能改造升级、新型工业化与信息化深度融合，也需要加大投资力度。我们的企业在节能减排上水平还比较低，要瞄准国内外新技术、新标准进行改造升级，促进绿色发展。我们还要加快发展新兴产业，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，这也要靠有效投资来带动。

增加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等有效投资，要创新融资机制，政府不唱“独角戏”，而是与社会资本成本共担、利益共享。我们正在通过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（PPP）模式，以较少政府投入撬动更多社会投资，有的项目撬动比例达到1:3甚至1:5。我们通过特许经营办法，吸引民间资本建设污水处理设施，扣除财务成本后，可以达到4%—5%的长期稳定回报。城市地下综合管廊的建设也采用商业化运作模式，各种电缆和管道入廊是要付费的，这样就有回款机制，能吸引社会资本参与建设。这些方面的投资有好几万亿元，有效投资的空间很大。

（五）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，深入推进大众创业、万众创新。党的十八大提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这一重大任务。怎么把这个战略落到实处？“双创”就是重要抓手、实现路径。“双创”符合历史是人民创造的这一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，符合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一党的宗旨，符合激发市场活力的客观要求。高手在民间，人民是真正的英雄。我们党几十年来创造和积累的经验，很重要的一条就是要尊重人民主体地位，调动亿万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。

我们必须从过度依赖消耗自然资源转向更多依靠人力资源，这是我国转变发展方式、调整经济结构必须要走的路，也是能够做得到的。我国人力资源十分丰富，是世界上任何国家都不能比的。我们有9亿多劳动力，其中技能人才近1.6亿人，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人数也有1亿多，大体相当于日本的总人口。只要更好发挥我国人力资源优势，用“双创”激发人民群众的创造力，我国经济发展前景是不可限量的。

“双创”有利于扩大社会就业。就业至关重要，没有就业就没有收入，没有就业也难有社会稳定。一些国家发生危机、社会不稳定甚至动荡，原因往往是失业人员过多。目前我国经济增长虽然放缓，但就业是稳定的，简政放权、“双创”等功不可没。“双创”还有利于调整收入分配、促进社会公平。最近，我去中部地区农村考察，在食品加工企业打工的一位返乡农民工就讲，宁愿在厂里每月拿两三千元的工资，也不去大工地拿四千元的工资，因为在企业更能学到自己创业的本事，将来好当老板。我们要鼓励“双创”，让更多的人依靠勤劳智慧富起来，让每个人都有公平的上升通道、有机会实现自身价值。

“双创”不仅创造了许多新业态，更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的重要途径。不能简单认为电商冲击了实体店，实体店刚开始确实有过痛苦期，但现在不少实体店线上线下一起做，销售额大大增加，因为他们的实力比较强、信誉度比较高，还能实现线上线下互动，通过网络给工厂下订单搞定制化生产和销售。我国已进入中等收入阶段，居民消费正在升级，定制化生产和销售更能满足群众多样化需求。我最近翻了一些美国有关创客、互联网的书，美国在提“创业美国”，他们认为美国这几年经济的恢复，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创客的创新，甚至可以说这已成为新工业革命的重要推动力量。在我国，这样的例子也不少：有的家电大公司，把整个企业做成了孵化器，几乎所有员工甚至企业外部的创客都进入到了创客空间，研发出了许多新产品；有的国有老企业，以创客空间的模式，围绕提高产品质量，攻克了不少技术和工艺难题，并带动几千名一线工人成长成才；有的科研机构，通过网络与多个城市的科研机构相协作，取得了重大关键技术突破；有的民营大企业，用众筹、分享经济等模式发展现代物流，大大降低了货车空驶率，带动了创业就业；有的创客公司，利用网络平台吸引了28万工程师等技术人员、汇集了3万多台机床的数据，既对接需求、提高机床利用率，又汇聚众智、为机床智能改造提供解决方案。这些例子说明，“双创”不仅是小微企业的兴业之策，也是大企业的兴盛之道。大企业人员多、市场大，在互联网时代更能体现线上的特征、线下的实力，在“双创”中有独特优势。“双创”做得好，对企业的组织架构、研发机制、生产模式、供销链条都会带来革命性变化，能够对企业提高研发效率、提升产品质量注入强大能量，是我们推动工业改造升级的新路径。

现在“双创”已蔚然成风，政府要继续加油助力，引导“双创”与“中国制造2025”、“互联网+”相结合，在创业创新中推动大中小微企业共同发展、传统产业改造和新兴产业成长并驾齐驱、服务业壮大和制造业升级互促共进，增强经济发展动力。政府应当清障搭台、放水养鱼，加强政策支持，打造综合服务平台，提供便捷高效服务，推动众创、众包、众扶、众筹等“双创”支撑平台加快发展，着力提高“双创”的成活率、成功率。

（六）推进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，打造“一带一路”和国际产能合作大舞台。对外开放是我们的基本国策，我们的经济已经与国际经济深度融合。我国是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，去年外贸总额4.3万亿美元，出口占全球市场的份额达到13%，这是长期努力得来的，很不容易。几十年来我们通过对外贸易的快速增长，促进了经济大发展，同时利用国际市场，形成了更大的回旋余地，成绩要充分肯定。同时也要看到，只靠或主要靠大进大出，长期处于国际产业链的中低端，搞加工贸易、贴牌生产，现在这条路子越来越难走了。我们要在守住已有阵地的同时，把更多精力放在推动优进优出上。据报道，很多人到国外大量购买马桶盖，“十一”期间又大量购买国外的感冒药、电饭锅、保温杯，而买回来的马桶盖、保温杯是中国生产的，但设计是别人的。去年我国居民境外消费超过1万亿元，其中一半以上买的是高档消费品。当然消费者有自己的选择。这个例子说明，我们迫切需要培育竞争新优势。中国人民的勤劳举世闻名，中国人民更有智慧，要把人民群众的创造力充分调动起来，既创造适合本土消费者的新供给，又增强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。

我们强调优进优出，就是要推进外贸发展由外延式向内涵式、由传统优势向新优势、由创汇向创利转变，提高中国产品质量和竞争力，培育中国品牌，加快建设贸易强国。要主动承接高端研发制造和服务外包等更高层次产业转移，主动进口有利于产业升级的先进技术、关键设备、核心零部件。前不久我会见了美国前财长保尔森、国际商用机器公司（IBM）董事长罗睿兰，他们希望中国进一步开放市场。我告诉他们，产品能否进入中国要让市场来选择，对高技术产品特别是高技术领域的研发合作，中国这个大市场有很大需求，我们一直持开放的态度，只是一些国家横加限制。我们强调优进优出，该进的商品还是要进。今年以来进口额负增长，主要是受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下降的影响，进口商品数量并没有减少，像石油、铁矿石、大豆等主要进口商品都是这样，有的还是两位数的增长。我国仍处在新型工业化、新型城镇化进程中，对自然资源需求的增加是长期的，适当进口紧缺资源是必要的，也是有利的。当然，要加快转方式、调结构，尽可能降低资源消耗强度、减少排放。我们相信，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，推动大进大出转向优进优出，可以闯出一条新路来。

推进新一轮对外开放，还要实施好“一带一路”战略，积极开展国际产能合作，两者是相辅相成的。从对外开放的进程看，发达国家都经历过从产品输出到资本输出的过程。像欧美，在海外的投资存量超过万亿美元。日韩等国也是走这条路子，先卖消费品，再输出资本和转移产能。现在我们也到了从贸易大国走向投资大国、开展国际产能合作的时候了。

推动中国装备走出去，这是国际产能合作的一大重点，还能倒逼国内产业提升标准和质量。目前我国传统的竞争优势有所减弱，但装备制造的优势较大。像高铁、核电、电力等装备，无论是制造还是工程建设，在国际市场上性价比都是很高的，具有较强的竞争力，走出去也取得了一些成绩。今年上半年我到巴西访问，乘坐了一家央企中标制造的船。这条船发动机很安静，行驶得很平稳，我在国内没有看到过这么好的国产船。我们的央企之所以能面向国际市场造出这样好的船，是因为国际市场竞争激烈，倒逼了产品质量的提升。年初我去南方的一家电力设计企业考察，看到他们为国外设计、建造的电厂，水平也比国内高，原因也是国际竞争激烈，不得不这么做。

开展国际产能合作，内利于己、外惠于人。对内，不仅可以倒逼产品和产业升级，还可以为富余产能找到市场，为经济升级腾挪空间；可以使企业更好地利用国际技术、智力和人才，促进创新发展；可以有效规避各种贸易壁垒，拓展国际市场，获得更加丰厚的利润；可以提高我国能源资源的保障程度。所有这些利益，都是长期的、可持续的。对外，对接发展中国家和中东欧国家需求，也能实现共赢多赢。国内一些有比较优势的富余产能，如能与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结合起来，共同开拓第三方市场，就更有优势。三方合作等于是三方共赢，发达国家可以把价高难卖的高档产品与我国的中档装备结合起来，用最优的价格让发展中国家受惠。

开展国际产能合作，要科学规划布局。可以从优势产业做起，重点是钢铁、水泥和铁路、通信、船舶等领域。仍有优势的传统制造业，要促进其向中西部地区转移，保持中国的世界工厂地位，不能出现产业空心化。在国际上，可以从“一带一路”沿线有意愿对接的国家做起，同时注意防范一些国家的政治、经济等风险。开展国际产能合作离不开金融的支持。我们不仅有具备竞争力的优势产能，还有充足的外汇储备，这是手中的两张“王牌”。现在一些国家装备和产能走出去，就存在融资的难题，而我们可以搞银企合作，提供便利的信贷融资，支持国内产能和装备走出去。

（七）保住基本民生，兜牢生存底线。保障和改善民生要区分基本和非基本，基本民生必须由政府来保住，非基本的需求则主要交给市场，使扩内需、促发展与惠民生协调互动，让人民生活不断改善。经过努力，我们已经织起了三张基本民生保障网，就是基本养老、基本医疗和免费义务教育，这是很大的成绩，在全世界都是了不起的。与此同时，我们还不断加强两个方面的基本民生工作，一个是改善居民基本居住条件，大力推进棚户区改造和农村危房改造，提供保障房，让人民安居乐业；另一个是消除家庭零就业的现象。应当讲，现阶段就业的压力还不小，全国每年有700多万高校毕业生需要就业，城镇每年需要新增1000多万就业岗位。今年前三季度城镇新增就业比去年同期少增了16万人，数量虽然不大，也有可能是自己创业了，没有统计到，但我们不能掉以轻心，要采取有效措施，绝不能让失业率特别是青年失业率攀升。

在保障基本民生中，必须兜住生存的底线。底线主要是针对贫困人口，过去叫绝对贫困，国际上也叫极端贫困。按照年人均收入2300元（2010年不变价）的扶贫标准，到去年底我国还有约7000万农村贫困人口。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，必须加快补上农村脱贫这个短板。我们要坚决打好扶贫攻坚战，更多采用开发式扶贫的办法，深入实施精准扶贫，搞好产业扶持、转移就业、易地搬迁等，到2020年让绝大多数贫困人口脱贫。剩下的一部分完全或部分丧失劳动能力的贫困人口，可以纳入低保来解决。到那时，我们的财力提高了，即使低保水平高一点，财政也是能够承受的。中央即将召开扶贫工作会议进行专门部署，这里我就不作详细介绍了。兜底线，还要加快完善社会救助体系，针对特困群众、突遇不测的家庭，解决好救急救难的问题。

医疗保障是我们面临的难题，也是世界性难题。我们用中国式的解决办法已基本实现了医保全覆盖，但水平还较低，是保基本的。现在因病致贫返贫的人口数量很大，全国近3000万个贫困家庭中，约1200多万个家庭是因病致贫。有的贫困居民有病无钱医治而自焚、锯腿，这虽是个案，但严重冲击社会道德底线和人们心理底线，我们不能再让这些极端现象频频发生。要让贫困家庭稳定脱贫，必须在大病治疗上给予保障。实现这个目标，单靠财政负担也有困难。我们创新了机制，运用大病保险的办法，把政府的基本医保和商业保险结合起来，从基本医保中拿一部分钱参加商业保险。这样做，有的地方大病费用报销上限可达到30万元，甚至达到40万元。目前大病保险覆盖了8亿人，明年要争取全覆盖，并稳步提高报销水平，让报销上限提高到60万—70万元。通过这种方式，可以解除每年约430万大病患者的后顾之忧，也就是说贫困人口中大部分大病患者可以报销主要的看病费用。解决这个问题，既要发挥好政府作用，也要充分调动市场和社会力量。

（八）充分调动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，形成上下联动推发展的合力。我多次强调，我国仍是发展中国家，要牢牢把握发展这个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，把握为人民服务这个党的宗旨，让人民过上好日子。这是我们共产党人肩负的责任。我国几十年的经验告诉我们，发展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，我们的发展是全国上下共同实干干出来的。特别是各地竞相发展、你追我赶、为民造福，得到了人民的拥护，这是我们党的执政基础，是社会稳定的必要条件。我们讲对中国经济有信心，信心不是从天而降的，除了经济基本面没有改变外，进一步的发展还得靠人去努力。古人讲，“上下同欲者胜”。全国上下都要统一思想，共同努力，咬住发展不放松，增强工作的主动性和创造性。

中央要继续为地方发展创造好的环境条件。古人说“居敬而行简”，意思是政府施政的要义在于以敬民之心行简政之道。但同时也反对太简，因为太简就没有了法度。这与我们简政放权、放管结合、优化服务有相通之处。国务院各部门要继续减少对微观事务的干预，给地方以更大的决策自主权、资金统筹权和改革先行先试权。对地方干部也要有合理的容错机制，让那些干事创业者大胆试、放心闯。只要出以公心、不谋私利，符合大的改革方向和当地实际，就不要求全责备。目前中央出台了推进领导干部能上能下的文件，就是要有个举直错枉的机制，让能者上、能者干。当然也要有惩戒措施，坚决整肃不作为。还要健全激励约束机制，推动地方之间良性竞争。对那些干得不好的地方，对那些给了项目、土地、资金却不干事的省份，国家要收回项目和资金，再分给干得好的省份。

地方要因地制宜开展工作。党中央、国务院出台的重要文件、作出的各项部署，考虑了地方实际情况，但有的还比较原则，这就需要地方根据实际去探索、去落实。千说万说、千条万条，不落实都是白说、都是白条。我到地方考察，看到各种各样的新鲜事物，感到人民群众的创造力非常丰富，很难一一列举。历史上也有类似的例子，后汉时蜀郡（今成都）房屋之间巷道很窄，有一段时期法令禁止百姓晚上摆小摊，以防火灾。太守廉范到任后废除了原来的法令，允许百姓晚上开店，但要求小店旁边必须有个蓄水池，起火时能够灭火。结果只有几年工夫，当地百姓就富足起来，他们编成歌说“平生无襦今五绔”，意思是说原来连短袄都没有，现在大棉袄五件都不止。为官一任，就要造福一方。大家都是在接受马克思主义教育、铭记党的宗旨、学习历史文化中成长起来的，心里始终要装着人民，对党和国家事业抱有尽责之心，按照党的原则、国家的规定创造性开展工作，做到守土有责、守土尽责。

最后，感谢来自地方和有关单位的学员、中央党校的同志参加今天的报告会，希望大家一起为中国发展鼓与呼，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不懈奋斗。刚才在休息室里，我看到墙上挂了一幅字，最后两句是“学习学习再学习，实践实践再实践”。希望党校的学员们百战归来再读书后，回到自己工作岗位上打好千战万战，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。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，锐意开拓，奋发进取，促进经济中高速增长、迈向中高端水平，为实现“两个一百年”奋斗目标不懈努力！